

礼德治邦的丰富诠释

“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实践

谢宾顺



“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展厅

今年9月16日,“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临展厅开展。展览分为“星火燎原、独开生面”“鼎定中原、王朝崛起”“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礼德治邦、无远弗届”“礼制千年、儒风浩荡”五个单元,集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33家博物馆的160余件文物于一堂,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中不乏重量级的明星文物,展示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壮丽画卷。

展览体现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流经中国北部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全长5400余公里,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以时间为序,讲述了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晚期青铜文明的起端发轫,到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发展,再到繁荣、扩张的青铜文明发展历程,以及礼乐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展览开始,绘制了世界青铜文明进程图,体现了我国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文明中的地位。展示了距今6000年左右,冶铜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000年左右,祖先将外来生产技术融入本土,青铜器随即出现在黄河中上游。展览讲述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分布,展示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龙山文化等时代出土的铜刀、铜矛、铜斧、铜锥等文物。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中游的先民发明了复合范乃至容器铸造技术,展览以此展示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齿轮器等,体现了青铜复合范铸造的高超工艺技术。随着青铜文明的发展,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代表着社会生产力产生了质的飞跃。我们的祖先在黄河两岸开垦、耕种,使黄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区域之一。

展览还展出了西周青铜重器——遂公盃(仿制),其98字的铭文,开篇第一句为“天命禹尊(敷)土,随山浚川”,讲述了禹受上天的旨意管理土地,顺应山川走势,用疏导河流的方法,治理了洪水。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关于大禹治水及其以德治国的文物实证记录,也让我们了解了先秦时期人们对禹的认知。展览还绘制了明代茅瑞徵的《禹贡总图》,体现了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奠定了华夏国家的雏形。随后展出了晋南、豫西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以爵、斝、鼎为主的青铜礼器,由此中国第一个世袭广域王朝——夏朝建立,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由此反映五千多年来,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充分体现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展览见证了黄河文化的交流与扩散,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展览中,同时展出了青海西宁市沈那遗址出土的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倒钩矛,介绍了倒钩矛是欧亚草原阿尔泰山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今在我国黄河中上游的青海、陕西、山西多地发现,是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在与展览配套的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国际学术论坛上,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梅建军教授从倒钩铜矛的发现及形制演变研究入手,指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比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与考古发现,梳理了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青铜技术、知识、工匠的流动关系,最后传入中原,奠定中原青铜文明的基础。展览还绘制了中国青铜文明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对照简表,将中国青铜文明与地中海青铜文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从格局、器物类别、纹式、铸造工艺、铭文、政治属性、内涵意蕴、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对比,充分展示了中国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文明的地位和作用,也

体现了中国青铜文明与世界青铜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

随着青铜文明传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发展、繁荣,形成了青铜文明的中心。展览展出了晋南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和平陆前庄遗址、灵石旌介墓地、闻喜酒务头墓地、浮山桥北墓地、石楼桃花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还有郑州商城、安阳妇好墓等地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与山东、苏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分析对比,发现其器型、种类、纹饰和铸造技术等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都具有典型的商文化风格,表明了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并向周围进行了扩张,由中原文明演进到华夏文明,最后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特别是青铜文明传入到长江流域后,如湖北盘龙城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在青铜铸造技术、器形、纹式发生不少变化,这是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尊崇和创新,展示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展览展示夏商周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形成历程,成为礼德治邦的典范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青铜器从产生,就因其高贵而华丽,也因其稀少,非平民所用,从而由生产实用发展到成为礼器,是王权之象征,国家之力量。展览以青铜文明的产生、发展、繁荣到扩张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以礼制的产生、发展、形成成为暗线,以夏朝的青铜礼器与其他礼器的组合展示,以礼制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明发展开启展览序幕。商朝以酒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青铜礼器种类更趋丰富,工艺更趋成熟,装饰更趋繁复,功能更趋多样,礼制逐步形成,至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周人承继夏、商礼制,周公“制礼作乐”,“礼”定规范、明贵贱;“乐”重教化、求和谐,礼、乐互为表里,承担着礼制的核心使命,规范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展览展示了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时期的丰尊、丰卣、陵彝、伯多父簋,以及关中地区杨家村窖藏出土单氏家族、微氏家族单叔鬲、叔父父匜、43年迷鼎(甲)等青铜器,以及何尊(仿制品)、义尊等明星文物,反映周朝礼制的青铜重器。展览还介绍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其融合了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涉及邦国建制、政文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车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以及各种名物、典章、制度,内容极为丰富,堪称古代文化史的宝库,是战国儒家对周礼理想化的总结。随后展出的一系列文物,介绍了周朝的鼎彝、乐悬、族墓、宗法、誓制、聘礼、嘉礼、射礼等礼乐制度,反映了周王朝建立的一套以礼制为核心,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制度体系。

随着青铜礼器的使用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青铜器在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也在不断创新,将青铜文明推向了高峰。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青铜文明所无法比拟的。展览展示的青铜器有春秋时期中国西部出土的秦公鼎、秦公簋、翼尊提梁盃等,南部四川的牧正父己卣、羊首六炳纹铜盃等,东部山东出土的丰鼎、丰卣、鲁仲齐卣、启卣、己伯盃、兽耳铜盘等,以及北方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波曲纹铺、云纹双系盃、龙柄兽足盃等,还有山西出土的陈信父壶、鲁侯鬲鼎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礼”制随着时代而改变。青铜器大量用于贵族日常生活,视为修身之“礼”,是礼制的延续。至战国中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及大规模地使用,中国青铜时代也走向终结。随之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代。其中,孔孟创立儒家思想,以尊崇“周礼”为核心,倡导“礼”和“仁”,体现了秩序和制度,闪耀着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光辉。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成为后世礼德治邦的典范。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物保护利用

——以奉节县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为例

刘原合 胡锦玉

乡村文物资源现状及保护利用情况

一是风格特色鲜明。2021年三峡库区奉节县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奉节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510处,广泛分布于全县各个乡镇、街道,包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1处、未定级文物466处。其中,全县已登录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清代古建筑为48处,多为家族老宅、宗族祠堂、佛寺亭塔,川东民居样式鲜明,木结构的大型建筑多以四合院的形式一套或多套成组,建成后由同宗同姓多代人居住在一起。革命文物10处,有兴隆镇的兴隆烈士陵园、夔门街道的彭咏梧烈士陵园等,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二是与旅游资源契合度高。奉节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三峡之首瞿塘峡,三国刘备、诸葛亮明君良臣的故事等自然和人文资源,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帝城白帝庙、白帝城遗址,永乐镇瞿塘峡摩崖石刻等文旅资源,每年吸引游客数以百万计。近年来奉节县有针对性地对白帝镇、吐祥镇、永乐镇等多个乡镇的重要不可移动文物开展了保护工程项目,完成了依斗门、开济门间古城墙完善工程、阳和山庄、太极亭、文峰塔等市保单位修缮保护工程。多个文旅融合项目已经实施,白帝城遗址等文旅路径开发已提上日程,依托白帝城·瞿塘峡景区2022年成功创建5A景区;依托耀奎塔、永安宫、依斗门及夔州府城墙的夔州博物馆园区2019年成功创建4A景区……文旅深度融合成为共识,旅游开发也为文物所在地群众创造了丰富的就业、创业岗位,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经济效益双重发展。

文物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文物保护与利用是一个长期课题,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势必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如何让文物在乡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当前一线文物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来说,机会与挑战并存。

推进文物科普下乡,让群众了解乡村文物。

推进文物科普知识下乡,是扩大群众文物认知,提升群众文化认同的必由路径。基层文物工作者在科普知识宣传中,应当注意“什么是文物”“为什么要保护文物”“怎么保护文物”这三个命题,采取群众喜闻乐见、传播速度快的方式。流动博物馆、乡村广播、院坝会等传统方式开展的文物科普活动,也应在互联网+的传播新业态下,借助新媒体资源,以微博、抖音、快手等用户基数大、传播量高的分发载体进行文物知识再传播。此外,还应侧重“因地制宜”原则,鼓励和联合不可移动文物所在乡镇携手,根据文物特点制定科普宣传内容以达到更好传播效果。

借助文物塑造乡风,让群众重视乡村文物。

红色文物蕴含优秀的乡风、家风,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宣传好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事迹,提取红色文物内涵,为群众提供新的精神滋养,也在潜移默化中传输给群众保护乡村文物就是保护乡村特色文化的观念。

依靠群众保护文物,让乡村文物安全起来。

要在专业力量不足的现状下尽可能保护好乡村文物,必须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落实县级及以上不



修缮后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帝城迎来各地游客

可移动文物和建筑、桥梁等文物的看护人,与群众签订看护协议,利用群众居住在文物周边的优势,支持其所负责的文物开展消防、安防隐患排查工作,如此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人手不足、照看不周的困境。近年来奉节县通过对文峰塔、太极亭、阳和山庄等一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落实看护人,达成了文物保护基本目标。

文物安全不仅依靠看护人,在通过文物科普、乡风改造引导群众重视文物的氛围中,文物的安防、消防,防止文物被盗窃、破坏等保护文物的意识也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如刊立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的奉节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长梁杆乡规民约碑”,其上记载了不准窝藏、庇护盗贼,不得分赃;不得引诱良民子弟同场聚赌;不得随意宰杀耕牛;不得盗砍山林树木等村民公约,一直受到群众的自觉保护。散布于各乡镇的烈士陵园、革命文物在群众特别是乡村青少年儿童中,起到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得到了较好的主动保护与管理。

乡村文物“活”起来,保护利用回馈民。

乡村振兴,要走共同富裕之路,绿色发展之路,文化兴盛之路。依靠群众保护文物安全,文物也要“活”起来,助推乡村经济、文化发展。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文物资源,在保护和利用并重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文物旅游属性,从而带动文物周边旅游产业发展,真正做到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保护的有机结合,做到群众保护文物安全,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如奉节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夔门悬棺,位于奉节县4A级风景区三峡原乡内,是目前奉节县唯一一处能够看到的悬棺遗址。目前三峡原乡的旅游开发已初具成效,如何利用好夔门悬棺这一文物资源,打造文旅亮点,应在旅游开发中提前布局。另一方面,要提高文物资源利用率,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以乡村文物为关键点,结合自然风光、农业活动、特色民俗,开展以亲子研学、农事体验、民俗观赏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形成文化体验与产业发展的互补局面,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的目的。

在乡村文物保护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忽略文物历史价值,较多群众对文物的理解还处于“值钱和不值钱”的阶段;二是文物保护意识薄弱,旅游开发项目对文物本体随意施工,破坏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责任分工落实不清,由于文物的所有人和使用者不尽相同,管理保护的机构和人员也不一样,存在部分文物保护和管理混乱无章现象。

乡村振兴,文化铸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必不可少。文物资源作为乡村文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发掘其内蕴的深厚文化,探索乡村居民与文物共同发展的良性生态,势必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成都芒城遗址等史前城址的考古学文化价值

傅浩

芒城遗址,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地势较为开阔的平原地带芒城社区。光绪十二年(1886),《增修灌县志·卷二·古迹》中记载:“芒城子,在县西南平场三里,明蜀藩庆符王奉鎔,召董卜韩胡兵驻此,仓忙筑城,故名。”因此,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称其为“芒城子”。

1996年,对于考古文博界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一年,在成都平原发现了都江堰芒城遗址和新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遗址、崇州双河、紫竹古城遗址6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城址。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6座古城遗址的文化类型较为一致,且出土器物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和承接延续的关系特征,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

1996年至1999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都江堰市文物局,对芒城遗址开展为期4年的考古发掘(后两年联合日本早稻田大学),发掘遗址总面积2582平方米,占遗址区总面积的2%左右。考古发现房屋基址11座,灰坑62个,灰沟50条。这些灰坑和灰沟中,饱含非常丰富的古代人类生活的实物遗存,有石斧、石铲、石钺等制作精良的磨光石器;有与宝墩遗址第二期文化陶器占比相当,数量庞大的夹砂陶和泥质陶碎片;还有植物考古发现水稻植物硅酸体残留物,证明其时农业种植物以水稻为主的证据。最终证实芒城遗址是一座距今4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处于同一时期,归属宝墩文化第二期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

芒城遗址内城面积约7.2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不仅有内外两道城墙,还有着四方包围的内壕沟。同时不排除有外壕沟的可能,因为在北外城墙外已发现有顶宽约17米,底宽约9米,深约2.5米的外壕沟。这种城垣结构,是成都平原8座古城中除新津宝墩遗址之外,“仁”,体现了秩序和制度,闪耀着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光辉。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成为后世礼德治邦的典范。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的建造与中原北方地区城址建造方法迥异,有着根本性区别。成都平原8座古城的建造都是采用“斜坡堆筑法”,而北方地区城墙一般

采用“版筑法”。两地筑墙方法的不同,所追求的实用用途也就各有侧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恰好处于全球性的北半球气候灾变期,而成都平原素有“西蜀天漏”之称,暴雨成灾和洪水肆虐已是气候多变的常态。先民们在选址筑城时,都会选择在距离河道不远,且明显高于周围地平的较高台地之上,其目的应与生活便利及防洪洪水有关。采用“斜坡堆筑法”营建的内外双圈城垣,除兼具御敌防守的功能外,因其足够厚实的墙基和斜坡式墙体,更可以很好地发挥抵挡洪水源头冲击以及利用墙体的斜面,起到削弱水势和顺水导流的作用,故这种筑墙方式更侧重于防洪导流的功能。而北方地区陡峭高耸的城墙,则更侧重于防御作战和御敌坚守的功能。

1996年成都史前城址群的重要发现,将成都的文明发展史提前了800至1000年,成为成都平原上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文明。实证了成都平原拥有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群,也充分证明了在先秦时期,四川地区拥有与中原地区相同规模的王都。而芒城遗址则是将都江堰的文明史和建城史提前了4300年。

同时,宝墩文化为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等古蜀文明找到了可以追溯的起源,把古蜀文明由点连成了线,证实了古蜀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其他古老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文明交流、融合发展,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11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四川省人民政府依据《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芒城遗址保护规划》,核定公布芒城遗址等文保单位的保护规划,着力强化了芒城遗址保护规划的法定效力,为芒城遗址展示利用工作奠定了基础。芒城遗址位于青城山脚下,距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仅15千米左右,拥有极佳的区位优势。为更好地“让文物活起来”,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创新融合资源,聚焦“大遗址”和“大遗址”,培育“世界遗产文旅矩阵”,将芒城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纳入政府重点工作项目,计划建设芒城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同时对芒城遗址周边作相应保护性展示,打造新的文旅资源集散地。